



国防大学 2 071 7464 4

邹永贤 著

《资治通鉴》
治国思想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吕振萬书籍出版基金

“厦门大学吕振萬书籍出版基金”是由吕振萬先生捐资 100 万港币创立的,用于资助厦门大学教师出版他们的专著及优秀教材。

吕振萬先生 1924 年出生,祖籍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1945 年毕业于中国朝阳大学(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与法学。毕业后赴海外开拓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他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在经济学及工商管理学学术上具有独特的理论见解,体现了现代大企业的先进管理思想,立有专著,发表了不少很有深度的文章。被聘为厦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

吕振萬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率先回国投资,先后在国内创办了 30 家现代化企业和成片的综合开发区,潘龙开发区的成功就是个典范。

吕振萬先生不仅是一位兼有现代化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艺术的企业家,而且不忘造福社会。他很重视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但他更重视人才和关心教育事业,在福建省捐资近一亿港币,为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序

治国安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现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为了借鉴，更重要的是为了弄清我们所由以出发的政治文化基础，必须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进行研究。为此，80年代，我在《国家学说史》一书中，就进行了中国国家学说发展史的探讨。近几年来，又觉得这样的探讨范围似乎窄了一些。应当进一步对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作全面的探讨。正是抱着这个目的，我重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下此书简称《通鉴》，凡引述此书，不再写书名，只标明卷数，朝代。）尝试研究它的治国思想。为什么选择《通鉴》治国思想的研究，作为整个治国思想研究的开始呢？不仅是因为它是一部史学名著，与司马迁的《史记》齐名，是中华历史文化的双璧，还因为它以资治为写作目标，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公元前403——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依据大量的史料，除正史外，还采用了二百多种杂史资料，经过19年的整理编写而成。可谓年代跨度最长，内容丰富，且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治国思想的著作。它具有比较好的典型性，像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知道天下的麻雀一样，剖析了《通鉴》的治国思想，也就可以基本上认识了地主阶级国家的治国思想。

《通鉴》是一部史书，我却不是想从中简单地熟悉历史，研究历史。我的研究目标是探讨治国思想，是从政治学、政治哲学的角度

进行的，而不是从史学的角度进行；只依据它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和论述，进行分析，得出我的结论，而不从事历史资料的进一步考证。所探讨的治国思想是《通鉴》一书的治国思想，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司马光等作者的治国思想，而且包括了该书所记述的各个朝代封建君臣们的治国思想，以及它关于国家兴亡、得失的历史记载中所体现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有些是与《通鉴》作者的治国思想不相同，甚至相反的。本来，研究地主阶级的治国思想，最好是研究那个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的理论著作，我在《国家学说史》中，就是从这些著作中探讨中国国家学说的发展史的。但在探讨过程中，总感到那个时代缺乏比较全面的政治学、政治哲学的理论著作，因此，我把目光转向了《通鉴》，觉得它虽是史书，但因为它是以资治为目标的，就一本书的范围看，它所包含的治国思想却是最丰富的，所以，我选择了它作为研究的对象，试图从史书中探讨治国的理论问题，本人以前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为了便于不甚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阅读，我在阐述、引录一些重要的评论和观点时，往往多引述一些史料，除了胡三省的注外，还加了一些我本人的注解，对一些历史典故，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如“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等等，都是这样处理的。

本书所依据的版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的，有元朝胡三省音注的版本。该版本还把近人章钰的校记择要附注在正文之下。本书在引文中只采用胡三省的义注，不采用其音注。地名方面的考异，除非是直接与其政治思想有关的，为了不累赘，一般也从略了。对章钰的校文，本书在引文中，基本上按“标点小组”的选择，只是为了减少引文的累赘，根据不同的情况又作了一些精简，如《通鉴》卷六，秦纪一，记赵王请李牧为将时，有言：“王复请李牧，李牧杜门称病不出，王强起之，李牧曰：‘必欲用

臣’。”〔章：十二行本作“王必用臣”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斋校同。〕从前后文看，校文与原文含义差不多，因此我在引文中就省去了校文。又如，《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唐纪四十八，记李泌论恢复府兵制，有言：“不过数番，则戍卒〔章：乙十六行本“卒”下有“皆”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土著。”校文指出正文漏掉一“皆”字，我认为校文可信，引用时，就直接把“皆”补在“卒”下了。再如，《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唐纪十六，记杜牧论置府立卫时，有言：“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出落铃〔章：十二行本“铃”作“铃”；乙十一行本同。〕键哉！”我认为对照前后文，“铃”字明显为“铃”字之误，就直接据章校文改正了原文了。

《通鉴》出书到现在已过了九百多年，其间中国的治国思想，即使只就地主阶级的看，也有发展，而且其间还有废除了帝制的共38年的中华民国的治国思想。《通鉴》当然无法包含在其出书后的治国思想的发展。可见，只研究《通鉴》的治国思想，仅就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来说，也是很不够的。但是，就“传统治国思想”这一专门课题的研究看，总要有一个开头。我不自量力，选择了这样一个开头，只想抛砖引玉，引起对《通鉴》治国思想的更多的研究，引起有志者对《通鉴》以后治国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共38年的中华民国治国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无产阶级国家治国思想的研究。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资治通鉴》之治国思想	(1)
一、《通鉴》治国思想产生之政治历史背景及经济基础	(1)
二、以儒为主,融儒法道为一体之国家观、治国观	(11)
三、司马光之治国“六言”与“五规”	(24)
四、《通鉴》之治国纲要及其特点	(34)
第二章 君道。治国始于君道	(69)
一、君主之德、才、识与“宏观大度”	(69)
二、“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	(103)
三、纳谏、兼听	(108)
四、驭臣八柄与南面之术	(122)
第三章 招贤选才。为治之要莫先于得人	(132)
一、人才为宝。得人才者,得天下也	(132)
二、德、才论	(139)
三、求才与用才	(155)
四、识人与得真才	(170)
第四章 治吏。治国先治吏	(184)
一、择吏任官	(185)
二、考绩、核真	(199)
三、信赏必罚	(215)
四、奖廉惩贪	(223)

五、吏风	(239)
第五章 礼治。“立政以礼”，“德又礼之本也”	(287)
一、“礼”与“礼治”之概念	(287)
二、立政以礼，天子之职莫大于礼	(289)
三、礼治乃永恒之理想	(293)
四、德治。“为政以德”，“德又礼之本也”	(303)
五、教化	(306)
第六章 法、刑。以法辅礼，德主刑辅	(331)
一、“以法辅礼”与“霸道杂之”	(331)
二、法、刑变革之记述与总结	(345)
三、赞“萧规曹随”与“国将亡，必多制”之戒	(354)
四、法必信，持法须平	(361)
五、执法在任人，颂“强项”，反酷吏	(370)
六、慎刑、惩诬	(385)
第七章 以礼治军。兵柄即国柄	(395)
一、为国者不能无兵	(396)
二、以礼治兵。政治与军事关系之总结	(409)
三、择帅任将。握兵柄与任将不疑	(437)
四、兵制	(459)
五、战略战术。军事辩证法	(466)
第八章 经济。“家给人足”乃国治之标志	(483)
一、经济繁荣，家给人足，乃国治之一重要标志	(483)
二、重农抑商	(490)
三、赋税、徭役、户口	(505)
四、货币、物价	(533)
第九章 历史影响。古鉴今照之反思	(544)
一、历史影响	(544)

二、一面难得但又是无色的古鉴	(547)
三、以古为鉴之鉴	(559)
四、古鉴今照之几点反思	(566)
跋	(579)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581)

第一章 概论《资治通鉴》治国思想

“治国思想”是政治哲学、政治学说史中的一个广泛的、包含多方面内容的概念。它与法学、哲学密切相关,以一定的国家观为指导,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自国家出现以来,就有治国思想,国家在发展,治国思想也在发展。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各自的治国思想,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有其自己的治国思想。

治国思想受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中、西文化不同,自然也要反映到中、西治国思想的差异上来。治国思想还受地理环境、国家大小、人口多寡等因素的影响。总之,现实中的治国思想永远是时代的、阶级的治国思想,没有离开时代与阶级制约的抽象的治国思想。因此,我们对《通鉴》治国思想的研究就不得不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探讨其时代特点、阶级实质,并追溯其思想渊源。《通鉴》的治国思想内容丰富,为了把握其要点,应当认真分析其治国纲要,然后再按其固有的逻辑,分章阐释其治国的主要项目。

一、《通鉴》治国思想产生的政治 历史背景及其经济基础

《通鉴》是北宋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费了19年的时光编写而成的,成书的时间是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它具有什么特点?它们与《通

鉴》的治国思想又有何联系？

史学界都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北宋，已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它与封建社会初期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这时封建的生产关系不仅完全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而且已从一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逐渐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代表这种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也从一个新兴的阶级转变为一个腐朽的统治阶级、行将没落的剥削阶级。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加剧，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矛盾也复杂化了。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已经经历了许多朝代，达一千多年。地主阶级国家机构、各种强力组织，以至于官吏队伍的组织与控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也有不少明显的发展与变化。与此相适应，意识形态上，特别是政治思想、国家学说、治国思想上，也有一系列的发展与变化。地主阶级已经积累了长期的统治经验，虽然没有封建社会初期作为新兴阶级那种朝气，那种革命性，但作为统治阶级却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阶级。这当然不能不直接影响其治国思想。总之，北宋时，地主阶级全面总结自己的治国经验已有可能。

其次是北宋王朝的特点也这样那样地影响了《通鉴》的治国思想，其中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1. 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北宋社会经济较诸隋唐五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引人注目。如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三大发明——火药、罗盘针、印刷术，就都是在北宋时完成的。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沈括写的《梦溪笔谈》总结了北宋的科技成就。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的主要表征是：商业性都市的繁荣、乡村集镇的兴起和纸币的流通。

北宋在土地制度上比诸唐、五代有其显著特点。首先，它在建

国后，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到了司马光生活的年代，“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日已成俗”（《宋史·食货志》），官僚大地主在全国的土地中，已占了 7/10 以上。其次，地主兼并土地除了依靠政治势力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购买方式取得土地成为越来越主要的方式。其三是官田普遍采取租佃制，而且日益私有化，不但政府承认，而且政府自己大量出卖官田。其四是由于租佃制的普遍存在，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少了。但土地占有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相对地更为突出了。地租是地主对农民的主要剥削形式。地租率很高，一般都在 50% 以上。由于要维持皇室的骄奢生活和庞大的官吏队伍的开支，以及向敌国进献大量岁币，北宋政府不得不向人民搜刮大量的赋税，征调名目繁多的徭役。因而那时徭役和赋税就特别的重。但是，官僚、豪强、大商人、寺观都有免役特权，所以这样繁重的赋役，便主要落在农民的肩上了。而且，土地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了流民，生活无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一些阶级关系，而农民与地主两大阶级的矛盾更加激烈，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农民起义与尖锐的民族矛盾纠缠在一起，震撼着北宋的社会，震撼着北宋朝廷的统治，使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求经济上、政治上的改革，以维持王朝的统治。治国问题，自然就成了统治者，包括最高的统治者——君主在内经常考虑的问题。如何才能治好国家？“以古为鉴”，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宋神宗为什么对《通鉴》发生兴趣的一个根本原因。北宋的社会经济情况、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特点，是产生《通鉴》的治国思想及《通鉴》这部著作的最深层原因。

2.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机构的发展、变化

鉴于唐末的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教训，北宋王朝把国家权力更加集中到中央，特别是军权，中央抓得更紧，它实行的禁军和厢军制度，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将帅不得专兵，没有调动军队的权

力。地方官调动频繁，完全没有兵权、财权。官吏队伍越来越庞大，北宋中期，仅由科举录取的人就超过了唐代的 20 倍以上。还有所谓“恩荫”制度，使皇族、外戚、品官的子弟获得官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阶层。择官、任人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吏治十分腐败。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司马光的所谓“治国之要”中只讲择官任人，信赏必罚，强调御臣术。

3. “积弱”闻名，在对外关系上屡受屈辱

北宋王朝鉴于唐、五代内乱引起亡国的教训，在治国的战略决策中，把如何稳定内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权，维持君主专制主义放在第一位。为此，采取了从改革军队制度到削弱地方政权权力的一系列措施。但是这样改革的结果，唐、五代的藩镇割据的弊病固然克服了，却造成了边防的无力，加以周边国家辽、金、夏的崛起，民族矛盾特别尖锐，宋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遭失败，丧权辱国。宋王朝就以“积弱”闻名于史册。这样的情况，不能不使《通鉴》特别注意边防在治国中的重大意义。

4. 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激烈而持久

由于国内外矛盾的尖锐，引发了改革的客观需要，又由于改革涉及了多方面的利益，有推动力也有阻力，两者的斗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

公元 11 世纪 40 年代的庆历年间发生了范仲淹等主张的“庆历新政”的改革。这次改革失败后，仅过了 10 多年，又发生了王安石为首的变法。司马光反对这次变法，他是反王安石变法的首领。在他晚年，从 50 岁到去世的 68 岁这 18 年中，所从事的两件大事，就是继续撰修《通鉴》和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参加的人多，延续的时间长，是历朝所没有的。《通鉴》主编是斗争中的一方的领袖，在编书中，从没间断过对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关心，这样的情况，自然不能不直接影响《通鉴》一书的政治观点。

5. 理学的兴起

在北宋,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也有显著的变化,最突出的是理学的兴起。理学中的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四派,前三派都起于北宋,朱熹所创的闽学,又是继承二程的思想的。司马光与北宋那几位理学的创始者,过从甚密,尤其是邵雍、程颢、程颐。他与二程,不仅政治观点一致,世界观上也很受影响。唯心主义的理学的国家观,强调君德,强调正君心为治国之本的治国思想就是明证。二程等唯心主义理学对传统的儒学治国思想已有所发展,这种发展也就这样那样地融入了《通鉴》的治国思想中去。

研究《通鉴》的治国思想,除了不应忘记《通鉴》所述的社会性质,它所述的秦以后的王朝,都是地主阶级统治的王朝以外,还不可不注意以上所述的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的特点,以及北宋王朝的那些特点。此外对司马光本人的政治态度,也不可不注意。

按照司马光自己所宣称的编著《通鉴》的方法,他是不可以在写历史中,用自己的政治观点、思想感情、个人好恶臧否历史人物,取舍历史资料和借题发挥的,但这很难做到。实际上,《通鉴》中仍然不免流露了一些司马光本人在当时变法与反变法斗争中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感情的。这点,胡三省在其《新注资治通鉴》的“序言”中,就已经指出来了。他说:“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预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

论，①樊英名实之说，②唐太宗君臣之议乐，③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④之类是也。”

所谓萧、曹画一之辩是指司马光在王安石实行变法时，他陪宋神宗读史时的一番对话。“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帝取文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宋史·司马光传》)胡三省说，司马光用曹参代萧何为相时，守萧何之法不变的故事，不足以说服主张变法者，因此跑到洛阳去编书，“不干预国事”。但心里却无限感慨，甚为不平。这股怨气憋在肚子里实在受不了，不能不在他所编的《通鉴》中有所吐露。接着便举了那四例，认为在那里，司马光利用史评，借题发挥，宣泄了他个人对新法，对王安石的不满，为自己的政治遭遇而鸣不平。

胡三省所举的那四例，是否都有那么一个意思，是可以讨论的。但说司马光在《通鉴》中流露了他对新法的不满，有时不免借题发挥，发泄他个人的情绪，却是可信的。因为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

①见《通鉴》卷一，周纪一，司马光写的史评，认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②见《通鉴》卷五十一，汉纪四十三，司马光借汉顺帝时处士樊英受皇帝礼聘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的事，写了史评，认为王者举逸民“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③见《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司马光就唐太宗君臣议乐写的史评。司马光认为“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于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批评唐太宗“遂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

④见《通鉴》卷二百四十七，唐纪六十三。司马光就李德裕与牛僧孺争辩是否纳吐蕃维州之降一事而写了史论，认为“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

的事例，作为旁证。例如，汉灵帝时，因“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而实行“三互法”（即婚姻之家及幽冀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的禁令），司马光为此写了一个评论。但他并不就“三互法”本身进行评论，却借题发挥，讥笑汉灵帝舍本逐末：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蒸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卷五十七，汉纪四十九）

人们都知道，春秋时，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反对这个改革，在给郑子产的信中讲了“国将亡，必多制”这句话。现在，司马光却在这里，把它借来批评汉灵帝“三互之禁”，这就难免有影射当时实行王安石变法之嫌了。如果就事论事，三互之禁虽然不是他所推崇的所谓“本”，但也不失为防止“人情比周”的一个办法，司马光的批评，并不公允。但要真正读懂他的史论，却只有联系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才有可能。

司马光借题发挥，主要是在史评，可是有时候他的政治态度、思想感情，也不免影响史料的剪裁和史实的记载。如对待商鞅变法的记载，《通鉴》基本上依据《史记》，但有的地方也不完全一样。且看：

《史记》：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刺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史记·商君列传》）

《通鉴》自“行之四年”以下全删了。包括“居五年，秦人富强”这样重要的论点。（卷二，周纪二）

《史记》：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商君列传》）

《通鉴》：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卷二·周纪二）

“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与“人多怨之”的差别，不仅仅是文字的差别，这是一望可知的。《史记》的提法不仅仅是更准确，而且指明了怨望者所属的阶层，这对商鞅显然有利。《史记》与《通鉴》都称商鞅“刻薄”。但从上述行文看，《通鉴》对商鞅的肯定，不如《史记》，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两书作者对商鞅变法评价的差异了。

即使是《通鉴》与《史记》文字上完全相同，要了解司马光如何理解那些文字的深意，联系考察一下司马光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言行，也是很有益的。如《史记》关于桑弘羊的记载。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这两段记载，在《通鉴》卷二十，汉纪十二上，除了“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这两句外，全被采用了。

但是司马光自己如何解释这两段文字呢？如果不联系他在当

时政治斗争中的言行，我们是很难了解的。据《宋史》记载，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关于“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的观点时，说了以下这些话：

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宋史·司马光传》）

“不加赋而国用足”即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意思。但是如果不看《宋史》记载的上面那段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又怎能理解《史记》记载这句话，是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是太史公为了以见汉武帝的“不明”呢？

以上所举事例，都是为了证明，研究《通鉴》的治国思想，如果不了解封建社会后期的特点，不了解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情况，不了解司马光的政治态度是不行的。此外，还应当看到中国地主阶级国家制度上的特点对治国思想的影响。

1835年，法国学者夏尔·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再5年，该书的下卷也出版了。这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专著。托克维尔肯定了民主制优于贵族制，对民主制充满信心，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内不可避免地普遍地到来。同时又依稀地感到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将是平等原则的威胁，甚至将根本破坏民主制。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的影响下，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1861年，又写了著名的《代议制政府》一书，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了资产阶级民主。他以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实践为依据，系统地论证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并全面分析了议会职能、选举权和行政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同时他也分析了